

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體系理論化研究及其知識論思辨：非均衡體系理論的知識論反思

郭 雪 真

(陸軍官校政治系副教授)

摘 要

從 1950、60 年代受到政治學「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國際關係理論開始嘗試建立科學的研究，「科學派」遂以「體系論」(system theory) 進行國際關係的理論化，國際關係的理論化也就成為國際體系的理論化。歷經 1960 年代只有少數國際關係學者關注國際體系理論的「相當低度發展的階段」，1970 年代起逐漸有較多不同的學者都嘗試藉由其他學科（例如社會學、生物學、控制學）學者的體系理論提出不同的「國際體系」理論化途徑，1980 年代由新現實主義國際體系理論主導的盛行時期，至 1990 年代建構主義及國際歷史社會學理論學者。歷經數十年的國際體系理論化發展，國際關係學者仍是以「均衡體系理論」的觀點為基礎，探索國際體系的特質、結構與變遷。到了 2000~10 年代則是出現迥然不同以往的國際均衡體系論，嘗試從新的「現代體系理論」均衡體系理論到「複雜理論」的「非均衡體系理論」觀點進行國際體系的理論化，豐富了國際體系理論的理論化研究。

本研究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運用「體系理論」作為國際體系理論化的探索進程，這從「均衡體系理論」而到「非均衡體系理論」的探索過程呈現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持續性、動態性及多樣性。本研究首先探討國際關係學者引入「體系理論」的歷史過程，以說明「體系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其次，探討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以說明各理論學派的國際體系理論化差異；第三，探討新興引進的「現代體系理論」與「複雜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以說明從「均衡體系理論」到「非均衡體系理論」的新觀點；第四，以知識論的觀點思辨「體系理論」在知識論上的意涵，以及學者以二元對立觀點思考「均衡體系」與「非均衡體系」的知識論誤解；最後，評論「非均衡複雜體系理論」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影響及可能發展方向。

關鍵詞：國際體系、體系理論、均衡體系理論、非均衡體系理論、複雜理論

* * *

壹、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從 1950、60 年代受到政治學「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開始嘗試建立科學研究的國際關係理論，也就是「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次大辯論」的主要爭論之處，「科學派」遂以「體系論」(system theory) 進行國際關係的理論化，作為其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尤其是由 Morton Kaplan 為主要代表學者。事實上，「國際體系」一詞是從體系理論引介而來，用以稱述原有的「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理論化也就成為國際體系的理論化。^①歷經 1960 年代只有少數國際關係學者關注國際體系理論的「相當低度發展的階段」，^②1970 年代起逐漸有較多不同的學者都嘗試藉由其他學科(例如社會學、生物學、控制學)學者的體系理論提出不同的國際體系理論化途徑，^③1980 年代由 Kenneth Waltz 國際體系理論主導的盛行時期，至 1990 年代諸多理論爭論 Waltz 體系論的時期，其中 Alexander Wendt 為代表學者，另有「國際歷史社會學理論」(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學者。即便歷經數十年的國際體系理論化發展，國際關係學者仍是以均衡體系理論的觀點為基礎，探索國際體系的特質、結構與變遷。到了 2000~10 年代則是出現迥然不同以往的國際均衡體系論，嘗試從嘗試從新的「現代體系理論」(Modern System Theory) 均衡理論到「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 的「非均衡體系理論」觀點進行國際體系的理論化，這些發展豐富了以國際體系為理論核心的「國際關係體系理論」(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研究。

這樣的國際體系理論化呈現出「體系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不僅檢視了國際關係各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也引導了國際關係各理論關注國際體系的新焦點，即是國際體系本身的均衡或非均衡特性。致使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國際體系的結構與變遷觀點，已不再只是以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均衡(stable equilibrium) 為其主要論點，就是假定國際體系是穩定均衡的，出現不穩定或不穩定均衡狀態(unstable equilibrium) 時，恢復穩定均衡狀態是主要目標，前者是指國際體系稍受干擾就會產生動盪而無法維持均衡的狀態，後者則是指國際體系受到干擾後恢復原有的均衡狀態。但「非均衡體系理論」則是認為國際體系本身就是複雜不規則的，是不可能恢復原有的穩定均衡狀態，是國際體系本身的解散與重組。新的非均衡體系理論觀點勢必為國際體系的理論化提供新的觀點，或許更能描述、解釋與預測當前的國際關

註① 最能顯示出此觀點的是 1961 年第 14 卷第 1 期的 *World Politics* 出版 International System 的專號，並由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成專書。參閱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註②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Introduction,"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1961), p. 1.

註③ 例如 Stephen D. Bryen 結合控制學與病理學探討國際政治體系的發展及病態，意圖先行找出國際體系的病態症候群。Stephen D. Bryen, *The Application of Cybernetic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gue, Netherland: Martinus Nijhoff, 1971)。

係或國際體系的演變與變化了。

本研究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運用體系理論作為國際體系理論化的探索進程，這從「均衡體系理論」到「非均衡體系理論」的探索過程呈現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持續性、動態性及多樣性。本研究首先探討國際關係學者引入「體系理論」的歷史過程，以說明「體系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其次，探討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以說明各理論學派的國際體系理論化差異；第三，探討新興引進的「現代體系理論」與「複雜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以說明此從「均衡體系理論」而到「非均衡體系理論」的探索或對話過程；最後，評論此過程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影響及可能發展方向。

貳、「國際體系理論」的基本概念與簡史

一、「國際體系理論」的基本概念

基本上，「體系」原是個生物學的分析概念，生物族群（populations）是構成生態體系的元素（components or elements）或單元（units），是用以描述生物族群之間及其與環境之間關聯性（interconnections）的概念。^④「體系」概念被引入國際關係研究國家之間及其與國際環境而為國際體系，國家也就被類比於生物族群，是構成國際體系的元素。但 Morton Kaplan 則是引述醫學的（腦）體系功能概念，說明其體系理論的起源與特質。^⑤國際體系是學者及實務者所創，並非客觀存在，而是存在於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它本身沒有目的，而是行為者有目的。^⑥國際體系假定其構成元素或單元之間、元素或單元與體系之間及體系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性，關注的焦點就在於此體系的性質、各構成元素及其之間的性質與界線（boundaries）、體系與各構成元素及環境之間的性質與界線，以及整個體系的均衡、穩定與變遷。^⑦國際體系的理論化是在於建構對此相互關聯性的關注焦點之論述，以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假定或是本體論基礎，例如國際體系的狀態（無秩序或秩序、均衡或非均衡、有機或無機、開放或封閉等等）、結構（單極、二極或多極權力；單一、二元或多元層級；層級位置；分殊化程度；體系與次體系關聯性；物質或理念結構等等）、維持與變遷（行為主體或結構、

註④ Charles A. McClelland,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註⑤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ocial Research*, Vol. 35, No. 1 (1968), pp. 20-47.

註⑥ Donald E. Lampert, Lawrence S. Falkowski, and Richard W. Mansbach, "Is Ther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2, No. 1 (1978), pp. 143-166.

註⑦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orton A. Kaplan ed.,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1968), pp. 381-404;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20-4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部分或整體、適應或轉型等等)。從事國際體系理論化的學者是假定了國際體系對國際現象的影響，國際體系層次的變數（例如結構、互動能力、文化）解釋了國際互動現象與國家行為，也就是國際體系變數是國際互動現象變遷的原因而不是結果，國際體系變遷與其內部變遷也是如此。就是指國際體系層次的變數或變遷過程不能化約成國際體系內的各單元、各部分（sectors）或各次體系（subsystems）的屬性及之間的互動，以及與整個體系的互動過程。

但本文關切的是以體系論作為國際關係體系理論化的發展，尤其是各國際關係理論處理國際關係（體系）成員（單元）之間、成員（單元）與整體國際關係（體系）及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簡言之，本研究關注於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ies），是以「體系理論」作為其國際關係體系理論化基礎的理論（例如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以國際體系的特質、結構與構成來理論化國家之間、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家之間的行為。以「體系理論」而言，這就是體系的構成單元相加，其結果是大過於其和，即是 A 構成單元對體系及環境的 a 影響，B 構成單元對體系及環境的 b 影響，AB 相加除產生了 a+b 的影響之外，還會產生 c 影響，這正是體系理論所強調的「迸生」（emergence）或「迸生特質」（emergent properties）。^⑧就分析層次而言，國際體系理論化是強調國際體系層次對於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也就是方法論的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是以見林不見樹、宏觀、由上而下的方式研究體系與單元的相互影響。

二、「國際體系理論」的簡史

國際關係學者多是引用「一般體系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作為其國際體系理論化的基礎，^⑨這始於 1955 年 Charles A. McClelland 呼籲以生物學家 Ludwig von Bertalanffy 發展的「一般體系理論」研究國際關係，他認為運用「一般體系理論」的概念與假設提供了較深入的觀點，並且克服了國際關係分析過於聚焦特定國際事件為肇因之缺點，而是聚焦於發展、適應與調適的過程。^⑩後有 1950~1960 年代的 Morton Kaplan 以 W. Ross Ashby 發展的「一般（封閉）體系理論」強調體系構成原則與權力分配而形成六種不同類型的國際體系，以解釋與預測國際政治。^⑪1970~80 年代的新現

註⑧ 國內學者葉啟政翻譯為「迸生」，另有翻譯為「突現」或「聚現」，參閱葉啟政，*邁向休閒社會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劉育成，「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體系論觀察」，*政治與社會哲學*，第 36 期（2011 年 3 月），頁 39~86；萬毓澤，「讓盧曼的體系理論（重新）成為問題：一個本黑式的視角」，*社會理論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47~194。

註⑨ John J. Weltman,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Polity*, Vol. 4, No. 3 (1972), pp. 301~329.

註⑩ Charles A. McClelland, "Applications of General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Thought* 12 (1955), pp. 27~34; Reprinted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p. 412~420. 他完整的國際體系理論，參閱 Charles A. McClelland,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註⑪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實主義者 Kenneth Waltz 以「一般體系理論」(但強調政治體系)與 Durkheim 的社會型式 (social forms) 理論化國際體系,認為國際體系是行動的社會體系,特別強調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以及國家在國際體系的位置。¹² 1990~2000 年代的 Alexander Wendt 在國際體系理論化上則是強調國際體系的理想結構(無政府文化)而非 Waltz 強調的物質結構,理想結構決定了國家的認同、利益與行為;¹³ 他提出以量子意識假設 (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 及全息腦 (holographic brain) 的觀點,說明理想結構促使國際體系的變遷。¹⁴ 2000~2010 年代的 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及 Richard Little 則是擴展 Waltz 的國際體系結構成為權力分配結構,並賦予歷史相關的排序原則 (ordering principles) (例如單元之間的互動能力、歷史偶發性),藉以發展出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的國際體系理論,解釋現代國家體系的發展及變遷。¹⁵ Buzan 和 Little 更以單位、互動能力、過程與結構等概念理論化國際體系,並與世界史結合而發展出觀察古代、現代及後現代國際體系的國際體系史理論。¹⁶ Patrick James 認為結構現實主義未能預測冷戰結束及後冷戰的狀況,其國際體系結構觀點是失敗的,他引用 Mario Bunge「體系主義」(systemism) 的功能關係觀點,將體系視為構成元素、環境與結構的三位一組 (triple),兼具體系與構成元素的觀點,結合整體主義宏觀角度與個體主義微觀角度,而且其影響可以跨越不同的分析層次(體系、國家和個體層次),發展其「精緻結構現實主義」(elaborated structural realism)。¹⁷ Mathias Albert 及其他學者引用德國社會學者 Niklas Luhmann 的「現代體系理論」(modern systems theory),將國際體系視為是世界社會體系,其中溝通形成此社會體系的基本運作,能藉由體系內在的分殊化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達成此世界社會的完整 (unity);¹⁸ Alexander Wendt

註¹²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¹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¹⁴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81~219.

註¹⁵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¹⁶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¹⁷ Patrick Jam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trick James, "Systemism, Social Mechanism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4, No. 3 (2004), pp. 352~370.

註¹⁸ Mathias Albert,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3~68; Hans-Martin Jaeger,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a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69~96; Mathias Albert and Lena Hilkermeier,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Stephan Stetter ed., *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World Society: Modern System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更認為，Niklas Luhmann 的現代體系論是最能促進或最接近量子的體系理論。^①但 Wendt 這樣的觀點需要深入探討，因為量子體系是不穩定的非均衡體系，^②而 Luhmann 的「現代體系」是均衡體系，兩者是不同的後設理論基礎假定，除非只是以知識論觀點嘗試綜合兩者觀點研究國際體系的變遷。

2000~2010 年代也有國際關係學者引進「非均衡物理學」(non-equilibrium physics) 與「複雜理論」，批判目前以個體經濟為類比的體系理論(例如 Kenneth Waltz) 是太短視且靜態的理論化，例如以分析為取向的研究途徑、以均衡為基礎的理論、以律則推論(nomological inference) 及行為者具體化(actor reification)，即使經典的體系理論也無法解決此問題，而是要以「複雜理論」的整體體系分析途徑、非均衡理論、以生成過程為推論(generative inference)、內生的(endogenous) 行為者等特性理論化國際體系，藉由電腦模式模擬或動態方程式模型(dynamic equation modeling) 分析及預測國際體系及其變遷。^③事實上，1990 年代就已經有國際關係學者(如 James N. Rosenau、Robert M. Axelrod 及 Robert Jervis 等) 引用複雜理論探索國際關係的變遷及重要議題。^④但到 2000 年代「複雜體系理論」觀點才受到關注，發展成「複雜國際關係理論」(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及國際關係理論第五次大辯論的稱呼。^⑤

誠如 Neil E. Harrison 和 J. David Singer 認為，「複雜理論」不只是個體系理論，它修正了體系理論在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不足，並且納入其它的理論。^⑥甚至也引用「混沌

註① Alexander Wendt, "Flatland: Quantum Mi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Hologram,"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279-310.

註② 例如各個粒子相互作用之後，各粒子特性已結合成整體性質而無法描述，只能描述其整體系統特性，這是量子纏結(entanglement) 現象；另外粒子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測定，這是量子測不準(uncertainty) 原理。

註③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Lars-Erik Cederman,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27-157; Bear F. Braumoeller,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58-191.

註④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Robert M.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⑤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p. 435-454.

註⑥ Neil E. Harrison and J. David Singer, "Complexity is more than Systems Theory,"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25-41.

理論」(Chaos theory) 作為國際體系的理論化基礎，不同於無政府體系的基礎，混沌體系才是國際體系的基礎。^⑤這樣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更複雜，並超越了一般國際學者對於國際體系的理解。

簡言之，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含括了強調均衡的「一般（社會）體系理論」與重視非均衡的「複雜體系理論」，前者強調國際體系的穩定、均衡與秩序；後者強調國際體系的失序、非均衡及混亂。兩者皆意圖以體系理論的觀點理論化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探究國際關係（政治、政治經濟）體系的影響與變遷。這連帶也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知識論目的產生衝擊，前者屬於實證主義研究強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結，即是理論與政策之間相關性（policy relevance），後者則屬於後實證主義研究聚焦於後設理論分析（metatheoretical analysis）；即使後者並未改變前者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主導地位，但已促使學者思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本身的獨特性，以及在不同的知識論基礎上思考「國際體系理論」的發展與未來。本文將在結論中，探討後者在此知識論的影響。

參、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

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注「國際體系」理論化的學派，主要是新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英格蘭學派（English School）、建構主義及歷史社會學，在同是採取體系理論的觀點下，呈現出不同的理論化方式與意涵。^⑥這些理論間並沒有孰優孰劣之分，而是各自依據不同體系論的前提假定，發展各自的國際體系理論化過程。

一、新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

從結構現實主義到國家體系社會學的結構現實主義開始，常有學者誤將結構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混淆了，^⑦實際上前者是要以結構論（structuralism）批判及擴展後者，^⑧英格蘭學派批判新現實主義而成為結構現實主義，Richard Little 曾簡略地指出，結構現實主義是假定國際體系內的單元之間存在著結構的分殊差異，單元與國際體系相互構成，單元的結構變遷，國際體系的性質也變遷了。國際體系必須分別從經濟、

註⑤ Dylan Kissane, "Mapping International Chaos," *Contemporary Issues*, Vol. 3, No. 1 (2010), pp. 17-27.

註⑥ 例如自由主義理論也有體系層次（system-level）自由主義學者，一類強調國際體系的規範性動力及民主和平，另一類尋求認為資本主義是國際體系的資產及理論化其影響。Quddus Z. Snyder, "Taking the System Seriously: Another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5, No. 4 (2013), pp. 539-561.

註⑦ Kenneth Waltz 本人較喜好新現實主義一詞，Robert Keohane 則將兩詞視為相同，參閱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p. 21-37, 特別是 p. 29; Robert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7.

註⑧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政治及文化等觀點探索，藉以檢視國際體系次體系的存在先後。²⁹ Buzan 和 Little 認為美國學者是從外部（即以實證主義）說明國際體系，英格蘭學派則是從內部（以歷史途徑）說明國際體系，他們兩人以政治軍事部門分析連結前者，以社會文化部門分析連結後者，使兩者產生綜合，將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視為國際真實（reality）的不同元素，而非建構此真實的不同方式。³⁰因此，需要分別討論兩者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藉以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

Kenneth Waltz 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是嘗試以體系的結構解釋（國家）行為及結果，³¹體系是由一組（set）互動的單元，在某一個層次上，體系包含結構，結構是體系層次的構成物（component）而使互動單元形塑成一組，使體系成爲一個整體。另一個層次上，體系包含了互動單元。體系理論的目的是顯現這兩個層次如何運作與互動進而解釋國家行為及結果，³²進而以排序原則、互動單元的特質及能力（權力）分配看待國家在國際體系結構的相對地位與權力分配，尤其在國際體系結構（兩極或多極）變化對國家經濟權力分配、軍事權力分配及國際事務處理的影響，特別是國際體系的維持或轉型。在兩極的國際體系結構，兩強皆有維持國際體系現狀的意願。³³但 Waltz 忽視與扭曲了「層級結構」（hierarchy）在國際體系的可能性、持續性及重要性，只以「無政府狀態」（anarchy）作爲國際體系的性質。³⁴ Buzan、Jones 與 Little 就批評 Waltz 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單元」觀點是結構理論而非（國際）體系理論，嘗試以結構現實主義較廣泛完整的觀點超越新現實主義。³⁵

不同於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Buzan 和 Little 結合層次分析、部門分析（sectors of analysis）、解釋來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及國際體系的認定基準（criteria for identifying）進行國際體系的理論化，並藉以分析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層次分析包括國際體系、國際次體系、單元、次單元及個體，藉由國際體系的分析層次由上而下的層次理解構成國際體系的單元類型；部門分析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社會文化）及環境，藉由部門分析理解各單元的混合；解釋來源包括互動能力、過程與結構，藉以理解國際體系的發展、運作及變遷；認定基準包括互動、互動模式、互動規模、構成國際體系的單元類型、國際體系類型（機械建構式或社會建構式）、結構化（單元與結構之間的關係，競爭式或合作式），藉以理解世界歷史上的不同國際體系發展，從長達 4 萬年期間的「前國際體系」（pre-international system）、西元前 4000 年出

註 29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arge-Scale Historical Change," in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London: Pinter, 1994), p. 19.

註 3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 415.

註 3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 32 *Ibid.*, pp. 40, 79.

註 33 *Ibid.*, pp. 129~210.

註 34 陳欣之，「國際體系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7 年 4-6 月），頁 23-52。

註 35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pp. 22~80.

現的第一個國際體系到 1989 年的國際體系。³⁶進而依據其社會政治凝聚力區分出強弱的國際體系，檢視強弱國家與強弱國際體系之間的假設。³⁷

由此可知，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理論化是比新現實主義更為精緻，不僅在國際體系結構的分析上，也在理論運用上擴及到歷史分析的範圍，使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理論化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最為值得關注的焦點。但是由於 Waltz 的盛名使學者關注新現實主義而忽視了結構現實主義，反因 Buzan 的關係而重視他所領導的英格蘭學派的國際體系理論化。甚至國際關係學界也因為結構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皆強調國際體系的結構特質，多將兩者視為是相同的理論，並不刻意區分兩者的差異。³⁸Waltz 本人後來也以結構現實主義稱述新現實主義，³⁹說明了兩者已經互通了。

二、英格蘭學派

英格蘭學派是近年活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派，⁴⁰藉由世界史結合國際體系（現實主義）、國際社會（理性主義）與世界社會（革命主義）三個關鍵概念，以及界定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及社會結構而理論化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即國際體系是由國家構成的社會（the society of states）或國際社會而至世界社會，三者是同時存在、相互作用。⁴¹國際體系是關於國家之間的權力政治，將國際無政府的結構與過程置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國際社會是關於國家之間共享利益與認同的制度化，將共享規範、規則及制度的創立與維持置於國際關係論的核心；世界社會是將個體、非政府組織及全球人口當作全球社會認同與安排的焦點，將超越國家體系置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⁴²Andrew Linklater 和 Hidemi Suganami 就以「國家體系歷史社會學」（the historical

註³⁶ 他們認為前國際體系期間至少長達 4 萬年，第一個國際體系的時空疆界出現在西元前 4 千年，延續至 21 世紀。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p. 68~110, 111~112.

註³⁷ *Ibid.*, pp. 409~414.

註³⁸ 例如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註³⁹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5~41.

註⁴⁰ 有關英格蘭學派的發展，參閱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Richard Little, "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1995), pp. 9~34; Cornelia Navari 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42.

註⁴¹ Cornelia Navari 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New Systems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95~219.

註⁴²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p. 7.

sociology of states-systems) 稱述英格蘭學派的歷史社會論點，清楚指出英格蘭學派以國家體系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歷史社會學觀點。^③要探討英格蘭學派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就必須從學派內區分出兩個不同階段，一個是 1950、1960 年代由「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成立的開始時期，以及 1990 年代由「國際政治理論英國委員會」(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發展的成長時期。^④或許前者可以稱為傳統的英格蘭學派，後者可以稱為現代的英格蘭學派。參考 Barry Buzan 的觀點，前者是以研究政治人物及政治理論者心中的國際社會想法為核心，後者則是強調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及社會結構。^⑤若以 Andrew Linklater 和 Hidemi Suganami 對英格蘭學派內的研究取向區分出結構、功能與歷史三種取向，但三種相互關聯，^⑥前者主要是結構與功能的研究取向，後者則是強調歷史的研究取向，但兩者仍是重是以歷史比較法理解國際體系。

傳統英格蘭學派是指受到英國國際關係學者 Charles A. W. Manning、Alan James、F. S. Northedge、Martin Wight、Edward Carr、Hedley Bull、Gerrit Gong、Adam Watson、John Vincent 及 James Mayall 的「國際社會」概念教導、直接及間接影響的學者。^⑦英格蘭學者以「國際社會」作為其國際體系理論化的核心概念，例如 Bull 和 Watson 認為國際社會是一群國家，它不僅形塑行為相互影響的一個體系，也已經藉由對話及共識為其關係的進行建立共同規則與制度，以及在維持這些安排上承認其共同利益。^⑧現代英格蘭學派進而擴展「國際社會」概念為「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 概念，世界社會是由所有人類普遍社會的共同目的或價值所構成的共善 (common good) 世界。^⑨英格蘭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仍是聚焦於國家，國際社會是由國家構成的社會；但世界社會概念則是超越國家概念而是聚焦於人類 (humankind) 概念。

現代英格蘭學派將「世界社會」作為理論化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與社會結構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說國際體系具備了物質與理念的特質，而非僅是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

註③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pp. 189-212.

註④ 這是英格蘭學派發展史中的兩個區分階段，參閱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pp. 1-13;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註⑤ Barry Buzan 就英格蘭學派理論的呈現方式區分為三種：政治人物的心中想法、政治理論者的心中想法，以及界定國際體系物質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外在強加概念。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pp. 12-15.

註⑥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3-80.

註⑦ Hidemi Suganami,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sm: An Anatomy of British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5 (1983), pp. 2363-2381;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p. 328.

註⑧ Adam Watso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Expansion"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32.

註⑨ Hedley Bull, *The Anarchy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84.

實主義所強調的物質結構。當然，這樣的觀點，在 Alexander Wendt 的國際體系建構主義也有，他的建構主義也有受到英格蘭學派的影響而來。

三、(國際體系) 建構主義

相較於其他的建構主義學者，Wendt 的建構主義強調國際體系及國家在國際體系的重要性。^⑩他同意 Waltz 有關國際體系結構影響國家行為與結果的主張，但他認為國際體系的社會（理念）結構比物質結構更為重要，因為它也藉由共享的觀念或知識形塑了構成單元（國家）的認同身分與利益，此共享的觀點形成國際體系的三種無政府文化結構，包括以競爭者為認同身分的「洛克文化」、以敵人為認同身分的「霍布斯文化」與以朋友為認同身分的「康德文化」。簡言之，國家的認同身分也影響了國際體系結構。因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構成單元（國家）之間的認同身分形成此三種文政府文化，當國家之間的認同身分由於互動而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也就改變了。^⑪這是國家的「（無政府）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並隨著國際體系的四項主變數（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及自我限制）及國家的模仿與社會學習而完成。^⑫換言之，國際體系是被社會建構而成的（social constructed），也就是國家間的社會互動關係所形成的，其中共享知識、物質資源及實踐是主要的元素。

Martha Finnemore 則是認為國際體系可以改變國家的偏好（what states want or preferences），進而改變國家的行動，特別是藉由國際組織的社會化而接受新的國際規範、價值觀及利益認知。^⑬簡言之，以國際體系的社會結構決定國家的行動。抱持這樣觀點的建構主義者還有 Jeffrey T. Checkel 等人，認為國家藉由國際社會化或國家社會化而接受國際制度的規範。^⑭但是國家（主宰、優勢國家或從屬、弱勢國家）在國際體系層級結構的位置，影響著國際社會化的結果。^⑮

由上述可知，建構主義學者強調國際體系的社會結構或理念結構而非新現實主義強調的物質結構，但對於國家的行為主體性（agency）則是有所差異，Wendt 就比 Finnemore 及 Checkel 重視國家的行為主體性。

註⑩ 有關建構主義理論學者的分類，參閱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11~148。

註⑪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⑫ *Ibid.*, pp. 325~327, 343~366.

註⑬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⑭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⑮ 陳欣之，「國際體系的建構與霸權統治」，頁 31~35。

四、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⁵⁶歷經三波發展而逐漸成為強調歷史社會結構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⁵⁷尤其是第二波的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促使國際關係學者重新思考現代國際體系及主要行為者獨特的社會起源。⁵⁸雖然其與英格蘭學派都強調歷史性，但其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則更為強調國際體系的歷史性 (historicality)，因為其認為國際關係本身是具有強烈的歷史關聯性 (connected histories)，應重新恢復原有的歷史性；並以社會互動體系看待國際體系，強調國際體系的複雜性。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學者歷經三階段的國際體系理論化途徑，第一階段引述社會學中歷史社會學學者的「國家體系」(systems of states) 觀點，作為其國際體系理論化及批判新現實主義國際體系理論化的主張。其強調在國際系絡或國際體系的國家形成與發展，尤其是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之間的歷史社會關係，主要是國際體系對國內體系的影響。其國際體系觀點是以國家體系而非單純的國家之間的體系 (inter-national systems) 為基礎，較強調國家體系的社會性。第二階段則是強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本身的途徑，以「國際體系」的國際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為基礎，其理論化強調國際體系及國家的歷史偶然性、結構與單元的多樣性及與體系的動態關聯性，以及結構與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構成及自主性，並且以「全球結構」與「世界社會」取代「國際體系」，擴展了「國際體系」為「全球體系」。近來的第三階段運用「複雜理論」理論化國際體系，認為國際體系是鑲嵌在物理 (自然、物質) 體系及社會 (理念) 體系之內的複雜調適體系 (a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產生 (autopoesis, self-production)、突現 (emergence)、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國際體系的模式 (無政府或層級) 及規律 (秩序或失序、穩定或混亂) 就是從體系單元的行動而具體化。⁵⁹

註⁵⁶ 也有以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及 Sociology of State-Systems 稱述。

註⁵⁷ 有關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參閱郭雪真，「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 (2013 年 9 月)，頁 63~96。

註⁵⁸ John M. Hobson,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414~430.

註⁵⁹ 郭雪真，「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之方法論評析」，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3 年會暨第 6 屆學術研討會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主辦，2013 年 12 月 7 日)。

表 1 國際關係主要理論的國際體系觀點

| | 國際體系的構成 | 體系運作機制 | 理論目的 |
|--------|--|---|--|
| 新現實主義 | 由互動的國家所構成，國家間相對地位與權力分布形塑成整體的體系。 | 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影響國家的行為與國際體系的維持或轉型。 | 顯現國家與國際層次如何運作與互動進而解釋國家行為及結果。 |
| 結構現實主義 | 由國際次體系、單元、次單元及個體所構成；並與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部門互動。 | 結合國際體系層次、部門、解釋來源及認定基準，發展出不同的國際體系。 | 理解世界歷史上的不同國際體系發展，依據其社會政治凝聚力區分出強弱的國際體系。 |
| 英格蘭學派 | 由國家構成的社會或國際社會而至世界社會構成，三者是同時存在、相互作用。 | 政治人物及政治理論者心中的國際社會想法，以及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及社會結構形塑國家相互影響的體系，並藉由對話及共識為其關係的進行建立共同規則與制度，以維持及承認其共同利益。 | 超越國家的國際體系而成為國家社會、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 |
| 建構主義 | 由共享的觀念或知識形塑了構成國家的認同身分與利益，此共享的觀點形成國際體系。 | 不同的共享觀點形成三種不同的國家認同身分結構（無政府文化）影響國際體系結構。 | 國家間的社會互動關係形成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社會結構決定國家行為。 |
| 歷史社會學 | 國家體系與國際體系的歷史性與複雜性，並以社會互動體系看待國際體系。 | 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之間的歷史社會關係、結構與單元的多樣性及與體系的動態關聯性，以「全球結構」與「世界社會」取代「國際體系」，乃至鑲嵌在物理（自然、物質）體系及社會（理念）體系之內的複雜調適體系運作。 | 理解國家體系與國際體系的歷史社會性及自我調適。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可以發現其中的異同（如表 1），例如都以無政府狀態作為理論化國際體系的前提假定，以穩定國際體系秩序及均衡為目的；但各理論對無政府狀態的本質有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認為是客觀存在，建構主義、英格蘭學派與歷史社會學認為是相互主觀存在，英格蘭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則又重視歷史性。總之，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體系理論化議題的重視，無論是單純的分析架構或複雜的分析架構，或是非歷史社會因素或歷史社會因素的分析，乃至國際體系物質結構或理念結構，都使得此議題是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基礎。遂有學者不斷從其他學科引進更新的體系理論進行國際體系的理論化。其中，源自社會學的「現代體系理論」及源自自然科學的「複雜（體系）理論」是新興引進的體系理論，值得關注與研究。

肆、新興引進的「現代體系理論」與「複雜理論」

誠如在第貳部分「國際體系理論」的簡史中所提，1990年代起到本世紀，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引進不同於「一般體系理論」的「現代體系理論」及「複雜體系理論」，這兩種新興的「國際體系理論」觀點雖仍是邊緣理論，但正逐漸引起國際關係學者的注意與重視，使國際體系理論化研究更為豐富。尤其是建構主義學者與英格蘭學派學者運用「現代體系理論」及歷史社會學者運用「現代體系理論」，強化其國際體系理論化論述。

一、「現代體系理論」

「現代體系理論」是德國社會學者 Niklas Luhmann 所建立，實際是以「體系理論」討論現代社會，尤其強調溝通在社會的功能，整個社會就是溝通體系，社會體系意味著是溝通體系，因為溝通構成了社會，社會則是確保溝通的持續性及接受性。^⑩他區分體系與環境，體系的複雜性低於環境，社會則是構成體系的環境，體系為降低複雜性而被迫不斷選擇，而在社會演化過程中發展出複雜的次體系因應環境的複雜性。沒有一個次體系可以代表整個社會，各次體系有其各自的理性與建構，這就是體系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異己指涉」(hetero-reference)「自我組織」(self-organized)及「自我產生」(autopiesis, self-production)。^⑪自我指涉和自我產生的體系分為生命體系(包括細胞、腦、有機體等等)、心理體系與社會體系，「現代社會」是世界社會也是社會體系。^⑫法律、經濟、科學及藝術都是社會體系。^⑬總之，社會中的各體系都是社會體系，社會體系是由溝通構成的封閉體系。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 Mathias Albert 是第一位引進「現代體系理論」進入國際關

註⑩ 對於國內國際關係學者而言，要初步了解 Luhmann 的社會體系理論，可以參閱張嘉尹，「國家理論—體系理論的觀點」，淡江大學法政學報，第1卷第5期(1996年)，頁87~107；魯貴顯譯，盧曼社會體系理論導引(臺北：巨流圖書，1998年)；高宣揚，魯曼社會體系理論與現代性(臺北：五南，2002年)。

註⑪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klas Luhmann,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Cambridge: Polity, 2012); 胡育祥，「魯曼社會體系理論中的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政治與社會哲學，第36期(2011年3月)，頁87~121。

註⑫ Niklas Luhmann, "The World Society as a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Vol. 8, No. 3 (1982), pp. 131~138.

註⑬ Niklas Luhmann, *Law as a Social System*, translated by Klaus A. Zieg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李君韜譯，社會中的法(臺北：五南，2009年)；Niklas Luhmann, *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1997)；張錦惠譯，社會中的藝術(臺北：五南，2014年)。

係理論研究的學者，他原先只是引此理論說明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的演變及爭論。^④他認為 Luhmann 的理論是極為複雜的社會理論，包括社會體系理論、社會分化理論及社會演進理論，社會體系是由體系與環境之間的差異，以及溝通體系所構成，透過社會內部功能分化達成社會一致性，演化成世界社會，國際關係如同是世界社會的政治體系。「現代體系理論」提供觀察國際關係的架構，國際關係則是提供「現代體系理論」豐富的經驗資料概念化世界社會的政治體系。^⑤他也和英格蘭學派學者 Barry Buzan 及其他國際關係學者運用 Luhmann 以「世界社會」作為最高層級的社會體系，藉由「社會或體系分化」(social or system differentiation) 理論，包括「分段」(segmented)、「階層」(stratified) 或「功能」(functional) 等三種分化理論研究「全球化」，發展出國際關係的「世界(全球)社會」理論。他們引述 Luhmann 的觀點，強調功能分化及溝通行動的作用及重要性，功能分化影響所有相互有關的互動與溝通，理性化則指出特定型式組織的溝通與行動符合整體社會中功能分化領域的各種邏輯。^⑥因為分化理論不僅有助於理解國際體系內的變遷，也有助於研究此體系在其社會環境的歷史變遷及當代變遷。^⑦所謂分段分化是每個次體系都平等，功能相同；階層分化是某些次體系高於其它次體系，形成層級式的(hierarchic)秩序；功能分化是指次體系由特定的一致活動及其從其他類型活動分化所界定，而且其差異並不只是來自其次體系的等級。^⑧當前「區域化」(regionalization) 的區域型式或區域整合型式，是展現出世界社會中分段分化與功能分化的重疊。^⑨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與英格蘭學派學者引進 Luhmann 的「現代體系理論」仍是以「一般體系理論」的均衡觀點為國際體系理論化基礎，並以社會體系的觀點理論化國際體系，其較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精進之處在於強調溝通與分化，使國際體系理論化從「國際社會」理論朝向具有整體性的「世界社會」理論發展。

註④ Mathias Albert, "Observing World Politics: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of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8, No. 2 (1999), pp. 239~265; Mathias Albert, "What Systems Theory Can Tell Us About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p. 93~111.

註⑤ Mathias Albert, "On the Modern Systems Theory of Society and IR: Contacts and Disjuncture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izing," in Mathias Albert and Lena Hilkermeier eds.,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3~29.

註⑥ Mathias Albert, "'Globalization Theory': Yesterday's Fad or More Lively than Ev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 No. 2 (2007), pp. 165~182.

註⑦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Int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

註⑧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Int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 Mathias Albert and Barry Buzan, "Differenti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2010), p. 318.

註⑨ Mathias Albert and Stephen Stetter, "Embedd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abric Differentiated World Society and a Differentiated System of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1~84.

二、「複雜體系理論」

不同於「現代體系理論」的社會體系觀點，「複雜體系理論」則是以自然體系觀點理論化國際體系。「複雜理論」分三階段被引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⑩而有「複雜國際關係理論」(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之稱。^⑪依據歷史社會學派學者 Erika Cudworth 和 Stephen Hobden 的看法，認為「國際體系」是一個鑲嵌在物理(自然、物質)體系及社會(理念)體系之內的複雜調適體系，具有自我組織、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國際體系的模式(無政府或層級)及規律(秩序)就是從體系單元的行動而具體化；由於國際體系是個自我組織體系、具有進生的特性，例如與制度結構有關的規範、規則及組織，與體系關係有關的極性與特質、不同的宰制、剝削及排除形式、中心與邊陲，與非線性有關的分枝(bifurcation)觀點、回饋機制及敏感性，因此，國際體系是個動態的、非線性體系的，且屬難以預測的體系。^⑫尤其「複雜理論」重新聚焦於關係的及反本質的社會本體論、過程及關係，^⑬並以「後牛頓科學」(post-Newtonian)及「非以人類為中心」(non-anthropocentric)的途徑研究國際關係中的結構與行為主體之關係，強調國際體系在此關係的作用，包括人類體系(例如國際組織、國家、個人)與非人類體系(例如氣候)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每個行為主體都是差異化的(differentiated)，其行為主體性在國際政治上是可能的，並超越既有以人類體系為主的國際關係(體系)，能以複雜體系或後人類(posthuman)體系思考國際關係，^⑭即是藉由結合複雜理論與生態主義(ecologism)而成的「複雜生態主義」(complex ecologism)發展出「後人類國際關係」(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及整個自然世界，不再是以人類為國際體系理論化的中心。^⑮

註⑩ Kai E. Lechmann,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hases of Complexity's Emergence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7, No. 3 (2012), pp. 404~413;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Lars-Erik Cederman,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pp. 127~157; Bear F. Braumoeller,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pp. 158~191.

註⑪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p. 435~454.

註⑫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2 (2010), pp. 399~416.

註⑬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7~50.

註⑭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Of Parts and Who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Human," *Millennium*, Vol. 41, No. 3 (2013), pp. 430~450.

註⑮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2011);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Of Parts and Wh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Human," pp. 430~450.

Hilton L. Root 就以複雜體系理論論述其「網絡全球社會」(networked global society) 理論，認為此社會就是複雜的整合體系、複雜的互動調適體系。複雜體系就是移去體系的一部分就會改變整個體系的基礎，體系藉由自我組織而適應環境的變化。他由此理論比較歐洲與中國內部的網絡結構，探索中國崛起是否挑戰了自由主義的全球正當性。^⑥

簡言之，國際體系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體系，而是社會體系與自然體系相互鏈結、相互演化的體系，各體系之間的複雜互動在適應複雜的環境，並且帶來各自體系及整個國際體系的變遷。這使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體系理論途徑更加精緻，國際體系不再是人類歷史社會的事實，而是涵蓋了非人類選擇的因素，國際體系是共同演化的結果。此外，「複雜理論」挑戰了既有國際關係理論的前提假定，例如「無政府狀態」(anarchy)，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認為此狀態是客觀存在的，建構主義則認為是相互主觀存在的。無論無政府狀態如何存在，其所代表的失序(disorder)是必須處理使其轉變成有秩序，只是各理論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複雜理論則認為失序、混亂才是國際體系特質，國際體系理論化也就是在非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假定下推論了，截然不同於前者的推論。^⑦

「複雜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是鑲嵌在社會體系與自然體系之間的歷史社會事實，國際體系是在開放的社會體系與自然體系下運作，尤其國際體系是個複雜體系，它是非線性、非機械及難預測的。運用「複雜理論」就必須注意國際體系是複雜的，而且秩序、失序與複雜性是共同存在及共同演化，具有不確定性及難預測性，是有其應用的優劣勢。^⑧甚至必須考量到「複雜理論」與國際關係之間的相容性或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也必須了解「複雜理論」只是補充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而不是取代國際關係理論。^⑨

新興的「體系理論」涵蓋了均衡體系的「現代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的「複雜理論」，一個是社會體系，另一個是自然體系，如何能類比到國際體系呢？其體系與環境、體系內外部的互動關係、體系變遷與其內部變遷都是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焦點。引入這新體系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大都認為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

註^⑥ Hilton L. Root, *Dynamics among Nations: The Evolution of Legitimacy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Stat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3).

註^⑦ Dylan Kissane, *Beyond Anarchy: The Complex and Chaotic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ttgart, Germany: Verlag Press, 2014).

註^⑧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p. 435-454; David C. Earnest and James N. Rosenau, "Signify Nothing? What Complex Systems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Global Politic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3-163.

註^⑨ Robert W. Glover, "Compatibility or Incommensurability?: IR Theory and the Complex Systems Analysi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www.e-ir.info/2012/07/21/compatibility-or-incommensurability-ir-theory-and-complex-systems-analysis/>.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14.

有助於以較為寬廣的歷史及地理系絡理解世界政治現象。⁸⁰ Daniel Nexon 認為新體系理論可以提供國際關係既有的「關係論者」(relationalists) 更多的洞察。⁸¹然而，Lars-Erik Cederman 就認為新體系理論必須直接依賴多元的研究方法矩陣及採取其他學科的類比，否則就會失敗。⁸²

表 2 現代體系理論與複雜體系理論的國際體系觀點

| | 國際體系的構成 | 體系運作的機制 | 理論目的 |
|----------|---|------------------------------|--|
| 現代體系理論 | 社會體系是由體系與環境之間的差異，以及溝通體系所構成，透過內部功能分化，演化成世界社會，國際體系如同是世界社會的政治體系。 | 藉由體系的分段、階層及功能分化形成世界（全球）社會。 | 提供觀察國際關係的架構及概念化世界社會的政治體系。 |
| 複雜（體系）理論 | 鑲嵌在物理體系及社會體系之內的複雜調適體系，具有自我組織、非線性、開放及共同演化的傾向。 | 動態、非線性及難預測的體系藉由自我組織而適應環境的變化。 | 超越既有以人類體系為主的國際關係（體系）而能以複雜體系或後人類體系思考國際關係。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所引述的「體系理論」及現有的「新體系理論」皆屬於均衡體系理論，強調結構、功能、穩定、模式、規律、界線、少層次、線性因果、體系生存與維護。「複雜體系理論」則是迥然不同於既有的體系理論與新體系理論，它屬於「非均衡體系理論」，是以非線性動態思考及批判均衡體系理論，但並非要取代而是補充均衡體系理論。若是能以理論對話的方式，將兩者的差異定位於知識論而非本體論，則將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的研究。

伍、「均衡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理論」的知識論思辨

國際關係學者分別引述社會體系理論與自然體系理論國際體系，並不在於爭論國際體系的本質存在，而是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的新概念工具。⁸³引述社會體系的「均衡體系理論」與自然體系的「非均衡體系理論」，雖不至於就此改變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

註⁸⁰ Mathias Albert and Lars-Erik Cederman, "Introduction: Systems Theorizing in IR,"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0.

註⁸¹ Daniel Nexon, "Relationalism and New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20.

註⁸² Lars-Erik Cederman,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pp. 152-153.

註⁸³ Ion Cindea, "Complex Systems-New Conceptual Tool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No. 26 (2006), pp. 46-68.

體系理論化，但可以確定這樣的理論化方式對國際體系理論化是有貢獻的。這是值得深入觀察與研究的議題，尤其是非均衡體系的「複雜體系理論」。就知識論的觀點探究均衡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理論之間的差異，以及兩者能否綜合或折衷，而有利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或國際體系理論化研究。

無論是社會學的現代體系理論或自然科學的複雜理論，國際關係學者引入這些新的體系理論重新概念化國際體系勢必對於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產生影響，因為這些新體系理論的觀點已經超越國際關係理論既有的體系理論觀點，從均衡體系理論而到非均衡體系理論，特別是複雜理論的非均衡體系觀點更是難以完全理解，甚至可能引發第五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④但隨著國際關係學者逐漸引入這新體系理論觀點，就更能發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例如均衡體系理論聚焦於秩序及穩定，非均衡體系理論聚焦於失序及混亂，這是兩種不同的知識論思維，但不應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探討，應以相互充實、互補的觀點探討，國際關係學者就可以從這之間尋求平衡的觀點探索國際體系的動態變遷過程，呈現國際體系理論化的豐富性。

為避免在論述此知識論思辨時，混淆了兩者知識論與本體論的差異，有必要先說明兩者之間的本體論差異。兩者的本體論差異可以藉由 Wendt 對於科學研究對象 (objects) 區分為自然類與社會類來說明，他以科學實在論 (scientific realism) 的觀點認為社會類與自然類有四項基本差異：第一，社會類 (social kind) 較具有「時空特殊性」(time-space specificity)，其理論難以超越時空而普遍化；第二，其存在以行為者相互連結的信念、概念或理論為基礎，行為者共享信念產生之前，它是不存在的；第三，其持續端賴人類的實踐，它不能獨立於人類之外，是信念與行動 (知行合一) 的功能；第四，兼具內外結構，它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不能以化約方式研究。^⑤簡言之，在論述知識論差異時，這些本體論的基本差異是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說在社會科學研究或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運用社會體系或自然體系理論是適當的、可接受的，兩者在知識論上是可以相容的，以利於理解均衡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之間的知識論思辨。

如同本文第參及第肆部分所述，國際關係理論多採取均衡體系理論進行「國際體系」的理論化，尤其是以社會體系的觀點為主，從新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英格蘭學派、建構主義到現代體系理論，只有歷史社會學派嘗試以複雜體系理論的自然體系觀點發展「後人類國際關係」，不再是以人類為國際體系理論化的中心。無論其結果如何，仍有必要比較分析均衡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理論的知識論差異，才能理解國際關係理論在國際體系理論化的研究。

首先，國際關係學者運用「體系理論」作為「國際體系」理論化的目的，在於認為體系理論使國際關係理論更具有解釋與預測的能力，進而使國際關係理論與研究成

註④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 438.

註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9-71.

為科學的研究。例如 Hedley Bull 就將國際體系理論稱為科學的研究途徑，但他並不看好科學研究途徑。⁸⁶ Morton Kaplan 則是從國際關係的科學提出辯護，認為他的國際體系理論是可以促進國際關係的科學；⁸⁷藉由均衡模型可以了解政治宏觀體系與社會宏觀體系中的目標導向行為，而研究社會科學的客觀性。⁸⁸ Ion Cindea 認為體系理論有助於社會科學及國際關係學科成為科學、科學學科的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等等。⁸⁹因此，在知識論上，國際關係的體系理論化意味著科學化，有助國際關係的科學研究及創造科學知識。

第二，體系或複雜理論本身不是理論，而是隱喻 (metaphor)、分析架構或是知識論原則，用以檢視通常所使用的理論知基礎假定。⁹⁰它是一般的分析觀點，是國際關係科學工具箱的新工具。⁹¹它不是統一的理論，而是新興的研究途徑或研究架構，是理論工具或概念工具，不是可以整體運用的單一理論。⁹²它是概念工具箱，箱中有許多可以運用的概念工具。⁹³總之，體系理論並不是實質的理論，而是協助學者創造或獲得知識的研究途徑或工具。

第三，體系理論不是處理政策問題的工具，不是哲學家用來打開社會宇宙及政治宇宙秘密或甚至體系宏觀結構的石頭，它只是達成政治體系或社會體系宏觀結構中層 (middle-level range) 通則的工具。⁹⁴因此，體系理論是以宏觀結構分析為主，難以進行微觀的 (外交) 政策分析與建議。雖然體系理論不必然產生解釋與預測，但它仍是國際關係學者尋找的「法櫃」(ark of the covenant)，⁹⁵希望能為國際關係研究提供神喻的啟示，指引研究的進步與發展。

對於體系理論在知識論上有了上述的基本理解之後，接著就要說明均衡體系理論與非均衡體系常為學者所誤解的二元對立思維，例如線性或非線性、穩定或變遷、知識一元論 (monism) 或多元論 (pluralism) 等等，兩者實為《易經》所言的陰陽相生的關係，「陰生於陽，陽生於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即是「太極」。在知識論上，

註⁸⁶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April 1966), pp. 361-377.

註⁸⁷ Morton A. Kaplan,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1 (October 1966), pp. 1-20.

註⁸⁸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Objectivity," *Theory and Decision*, Vol. 5, No. 4 (1974), pp. 441-446.

註⁸⁹ Ion Cindea, "Complex Systems-New Conceptual Tool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1-54.

註⁹⁰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5, No. 1 (2013), pp. 36, 45.

註⁹¹ Ion Cindea, "Complex Systems-New Conceptual Tool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7.

註⁹² Sylvia Walby,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eory, and Multiple Intersec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7, No. 4 (2007), pp. 449-470.

註⁹³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註⁹⁴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45-46.

註⁹⁵ 聖經出埃及記中提到法櫃是存放上帝與以色列人簽訂契約的櫃子，是猶太教、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聖物。Paul F. Diehl, "Theorizing at the Highest Level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4), pp. 687-689.

均衡體系與非均衡體系是相生相變的關係，皆有助於理解國際體系及其變化。

一、線性或非線性

Emilian Kavalski 認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五次大辯論聚焦於線性與非線性，^⑥在線性世界，因果之間的關係是等比例及非變異的（non-varying）。^⑦非線性世界的因果關係則是非等比例及變異的，也就是說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並未存在著必然的或固定的因果關係，而是存在著各種可能的因果關係，各種轉型或變遷都是可能的。強調國際體系結構的均衡體系理論是以線性思考國際體系的變遷，認為國際體系穩定意味著和平與秩序，不穩定就是戰爭與混亂；不穩定狀態必須重新回復穩定狀態，穩定與不穩定狀態之間是動態均衡，依著循環的（cyclic）線性觀點而發展；但非均衡體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變遷複雜，要以非線性思考國際體系不穩定狀況，失序或混亂不意味著戰爭或衝突，穩定與不穩定狀態之間是非均衡的狀態，依著渾沌的（chaotic）非線性觀點而發展，國際體系穩定與否與強國霸權無關，甚至國際體系穩定與權力平衡之間是非線性迴歸的因果關係。^⑧例如源自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論、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或強國興衰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以及英格蘭學派與現代體系理論都是線性均衡的觀點；Wendt 的量子建構主義理論與複雜體系理論是非線性的非均衡觀點。

真實世界或國際關係本身是無法區別的，學者為探求真實世界或國際關係而創造出線性或非線性思維假定或邏輯推理（inference）的區別，藉以獲取知識推理真實世界或國際關係。遂在知識論上，區分出線性與非線性的現象、部分或事實（facts）而有線性與非線性的思維或邏輯，以各自的思維或邏輯推理真實世界或國際關係。若能結合兩者的推理邏輯就更有助於理解國際關係的運作，而能解釋及預測國際關係或國際體系的變遷。線性均衡體系與非線性非均衡是互補的推理邏輯，而不是對立的推理邏輯，兩者是「一體兩面」的推理邏輯。

線性均衡體系是以體系單元為基礎概念，以線性觀點探索單元互動構成的體系及其內外相互關係，即是以行為主體（agents）或行為者（actors）為分析焦點；非線性非均衡體系是以非線性關係為基本假定之一，非線性關係是以行為主體互動網絡（networked）關係思考體系內外的互動模式，國際體系的結構是複雜的網絡，要以社

註⑥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 445.

註⑦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 p. 404.

註⑧ Diana Richards, "A Chaotic Model of Power 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1993), pp. 55-72; Alvin M. Saperstein, "Alliance Building versus Independent Action: A Nonlinear Modeling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6, No. 3 (1992), pp. 518-545.

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探索體系內外的互動、相互關聯與共同演進。^⑩就知識論而言，這兩者之間並非對立，前者是可以涵蓋於後者，若是以複合體 (complexities) ^⑪的觀點探索國際體系的變遷，就能以先線性均衡後非線性非均衡的分析步驟，結合兩者的分析單位，前者是「點」後者是「面」結合而成「立體」的複合體。簡言之，複合體是以行為者或行為主體為中心所形成的互動網絡，國際體系分析就是探索由各自行為主體構成的網絡間互動及複合體關聯，即是特定國家互動模式形成的網絡及複合體。例如以美國為中心、以德國為中心或以其他國家為中心的網絡及網絡複合體關聯的互動與結構，先以線性思維分析這些中心國家塑造網絡的互動過程與結構 (即網絡)，再以非線性思維分析各網絡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構 (即複合體)，最後以中心國家、網絡及複合體相互對應中心國家、網絡及複合體或是各而非特定國家的互動。如此，線性與非線性的推理邏輯都能整合在研究之中，獲取相關知識。

二、穩定或變遷

體系理論並不必然意味著功能目的論的 (functional-teleological) 假定，均衡體系並未假定追求體系秩序、穩定與維持，「非均衡體系」也並未假定追求體系失序、變遷與崩解，兩者是「一體兩面」或是「序中有亂、亂中有序」，只是相對的狀態而已。無論是「均衡體系」或「非均衡體系」，都只是研究選擇的問題，不同的均衡狀態區別不同的體系假定；假定體系穩定則是基於研究簡潔原則 (principle of economy)，控制參數 (parameters) 或變數的數量及變異，易於建構體系理論，藉由均衡狀態的穩定作為研究非均衡體系的參考點。^⑫體系理論並未意味著渴望體系穩定或其潛在性，只是先研究均衡穩定狀態才能研究非均衡不穩定狀態，因為知道那些參數會產生變異或不穩定的行為，就能知道體系變遷、發展或崩解的原因，也就知道這些改變的條件 (conditions) 為什麼與體系先前的狀態不一致了。^⑬因為體系理論假定的是動態 (homeostatic) 均衡及多重穩定的體系，沒有獨立的測量方式，只是為了分類及作為研究的起點而已。體系理論不是所有體系的普遍理論，是比較的理论取向而不是普遍的理論取向，是體系理論相關概念的抽象 (abstraction) 而不是真實，是作為比較歷史分析之用的啓示 (heuristic) 模型。^⑭

註^⑩ Antoine Bousquet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3-62; Lars-Erik Cederman,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pp. 127-157; Bear F. Braumoeller,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pp. 158-191;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⑪ 「複合體」 (complexities) 的英文以複數表示是要區別複雜理論的「複雜」 (complexity)。

註^⑫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32-33.

註^⑬ Morton A. Kaplan, *Macropolitics: Selected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pp. 57-70.

註^⑭ Morton A. Kaplan,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33-37.

「複雜體系理論」學者 Robert Geyer 和 Steve Pickering 也認為，人類必須在其共生的演進環境中，持續的尋求失序與秩序之間的平衡。㉔說明了複雜體系的非均衡理論也是尋求失序與秩序之間的平衡，均衡只是相對穩定的狀態，非均衡只是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在知識論上，除非能觀察、界定、測量，否則是難以確認及斷定。簡言之，體系理論是以動態均衡的觀點看待體系，穩定或變遷都是此動態過程中的一部分，是無法以「抽刀斷水」的方式劃分出穩定或變遷、秩序或失序，因為一切仍在變化的過程，或是「移動中的均衡或非均衡狀態」(moving equilibrium or non-equilibrium)。

三、知識一元論或多元論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經第三次大辯論之後，後設理論或知識論的爭論雖沒有定論，但若以兩極化分類，既會混淆各理論的差異，也阻礙了新理論的產生，不如以辯證邏輯方式折衷、綜合或相合不同對立的立場，以知識多元論接受較為精確的分類。㉕國際體系理論的知識論立場應該學習此經驗，均衡體系與非均衡體系的兩極化分類以對立的線性或非線性、穩定或變遷為基礎假定，嘗試建立各自的知識一元論觀點。實際上，「國際體系理論」都是學者創造來研究、分析、解釋與預測國際現象，是為增長國際關係知識而存在。Kaplan 就指出要確認「體系」的存在是相當困難，㉖它只是分析架構或概念架構，以獲取國際關係的相關知識。誠如上述所言，無論線性與非線性、穩定與變遷都是一體兩面而不是對立的，這意味著國際體系理論化的知識論不是一元論，無論是均衡體系或非均衡體系都不能主張一元化的知識論。「現代體系理論」是在充實既有體系理論所忽略的「溝通」面相，即使非均衡體系的「複雜理論」是新的致知方式，也並未排斥既有的均衡體系理論，只是提供另類的研究選擇而已。若只是偏於一元論就會有化約論的知識危險，知識多元論有助於獲得較為完整的知識，㉗尤其是難以確認本體論問題時，知識多元論是不可避免的，並能促進國際關係知識的增長。但知識多元論也不意味著極端的知識相對論 (relativism) 或知識無政府論 (anarchism)，而是以開放的立場或觀點接受不同的致知方式，例如均衡變遷 (失序)、非均衡穩定 (秩序)、線性非均衡、非線性均衡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方式。

註 ㉔ Robert Geyer and Steve Pickering, "Applying the Tools of Complex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From Fitness Landscapes to Complexity Cascad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 13.

註 ㉕ 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爭論：國際關係學科的科學進展反思」，*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 (2013 年 9 月)，頁 1-41。

註 ㉖ Morton A. Kaplan, "Som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Resear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6), pp. 51-84.

註 ㉗ 有關知識多元論的觀點，參閱 Alexander D. Barder, "Global Cognitive Justice: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4), pp. 653-665.

表 3 均衡體系與非均衡體系的知識論思辨

| | 均衡體系 | 非均衡體系 | 本文思辨觀點 |
|------|------|-------|---------------|
| 邏輯推理 | 線性 | 非線性 | 互補、一體兩面、複合體思考 |
| 體系目的 | 穩定 | 變遷 | 動態均衡、仍在變化 |
| 知識論 | 一元 | 多元 | 開放的多元論、各種可能性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有關均衡體系與非均衡體系的知識論思辨中（如附表 3），可以理解國際理論或國際體系理論化應該以知識多元論的開放觀點而非知識一元論的對立觀點，接受不同的知識論立場（但不是知識相對論或無政府論）相互充實國際體系理論的知識，協助國際關係理論更能發展科學的知識，以理解及解釋國際關係現象。

陸、結論：非均衡複雜體系的影響

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體系」理論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必須探討的議題，隨著引進其他學科的體系理論觀點，不同國際關係理論遂發展出來的不同體系理論化觀點，各種體系理論化觀點之間的競爭也反映出各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競爭，無論是均衡或非均衡、動態或靜態、一元或多元、有機或機械...等等，都是呈現出彼此之間的對話，即使這樣的對話並沒有產生共識，但這是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與進步。尤其是不同於既有的均衡體系理論觀點的非均衡複雜體系理論引入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體系理論中，必然會產生若干影響，也會影響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發展。

第一，若是以後設理論分析「非均衡體系理論」，則將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陷入後實證主義研究的困境之中，缺乏理論實踐的意涵。因此，要以概念工具或是啓示性裝置（heuristic devices）看待「非均衡體系理論」或「複雜理論」，它只是提供更多的想像力協助學者理解國際體系的變遷。如此一來，也就不會陷入「知識恐慌症候群」（intellectual phobia syndrome），恐慌學習國際關係理論需要理解的學科知識遠遠超過學者個人的能力。因為「複雜體系理論」（「非均衡體系理論」）不是實質理論，它是知識論的觀點，可以協助國際關係實質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建構更好的國際體系理論。例如以各種電腦程式模式模擬行為主體（行為者）之間、行為與環境之間可能的複雜互動變化，以說明非均衡體系理論的適當性及可行性。^⑩複雜體系理論學者就以「行為主體模式模擬」（agent-based modeling）藉由電腦模擬特定條件下可能產生的變遷，說明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各種策略達成目標之可能性，^⑪使現實主義強調的競

註^⑩ Armando Geller, "The Use of Complexity-base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echnical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f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63-80.

註^⑪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爭與自由主義強調的合作都能模式模擬理解不同行為者的可能行為選擇。或是藉以檢視及超越各類現實主義的「國際無政府」假定，因為這假定使現實主義無法解釋今日的世界。⑩若能如此，非均衡複雜理論就更能提供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不同的觀點與想像力。

第二，「複雜體系理論」的自我組織複雜調適體系觀點，將會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概念，這樣的體系觀點是有助於發展動態變遷的「國際體系理論」，補充既有國際關係理論的均衡體系觀點。因為它關注跨越時空的互動所帶來的體系變遷，強調國際政治的不可預測性，⑪這正是既有國際關係理論所不足之處。由於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是以「均衡體系理論」為基礎，聚焦於秩序與穩定，但「非均衡體系理論」聚焦於失序與混亂，隨著「非均衡體系理論」引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提供不同於既有的「均衡體系理論」觀點，將會促使聚焦於國際體系失序與混亂的研究將會增多，尋求建構自我組織複雜調適體系及機制，例如 Antoine Bousquet 研究恐怖組織如何在沒有領導者下自行組織運作發動攻擊行動，⑫並以複雜調適體系發展出「混沌複雜」(chaoplexity) 或「混沌複雜戰爭」(chaoplexic warfare) 概念思考軍事組織未來的調適。⑬Seva Gunitsky 用以檢視說明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無法解釋國內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以及說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負面回饋的民主擴散。⑭Walter C. Clemens Jr. 用以分析後共產黨國家的發展，以理解歐亞大陸的國際事務變遷。⑮也有學者致力於複雜調適體系電腦模擬的後設理論研究，⑯並且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例如模擬技術應與國際關係理論獨立分開，因為是行為主體（行為者）藉由歸於（ascribed）其本身的規則反映了國際關係理論的世界觀點；以及強化行為主體為基礎的社會模擬模式的驗證（verification）與確認（validation）等等。⑰但因為國際關係學者應用「複雜調適體系」會面臨基本概念定義，以及能否改善國際關係理論使用的嚴厲指控，而且需要知道其應用範圍與限制，⑱其影響力則有待觀察。

第三，國際關係理論的後實證研究已經較不關切「政策相關性」了，「非均衡體系理論」更是脫離了「政策相關性」，因為其非線性的思維、聚焦失序與混亂，以及不確

註⑩ Dylan Kissane, *Beyond Anarchy: The Complex and Chaotic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⑪ Kai E. Lechmann,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hases of Complexity's Emergence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p. 406.

註⑫ Antoine Bousquet,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War on Terror: Understanding the Self-Organising Dynamics of Leaderless Jih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3 (2012), pp. 345-369.

註⑬ Antoine Bousquet, "Chaoplexic Warfare or the Future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pp. 915-929.

註⑭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5-58.

註⑮ Walter C. Clemens J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3).

註⑯ Thomas B. Pepinsky, "From Agents to Outcomes: Sim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3 (2005), pp. 367-394.

註⑰ Armando Geller, "The Use of Complexity-base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echnical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f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pp. 72-75.

註⑱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6.

定性等特性，致使其「因果關係」或「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 不易掌握或難以預測，也就無法進行解釋與預測了，遑論政策建議了。即使如此，「複雜體系理論」學者仍認為非均衡的自我組織複雜調適體系，能提供外交決策者若干基本原則作為分析的參考，協助處理其所「未知」(not knowing) 的事務，藉以做出相關行動達成政策目標。^⑩或是分析國際情勢的發展，或尋求解決衝突的方法。^⑪

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非均衡體系理論」的理解與知識是否足以適切地運用於國際關係實務的研究呢？同時，其他學者是否又有足夠的理解能力呢？正當後設理論研究蔓延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際，如今「非均衡體系理論」的引入是否又會增加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與更加邊緣化呢？姑且將這些議題擱置在一旁，純粹以知識論思辨的觀點來看，非均衡體系既不在取代主流理論也不在發展統一的知識論觀點，它是提供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另一種知識論觀點，有助於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與研究。尤其是不同的「非均衡體系理論」學者本身對於其知識論的可能性是抱持著高度的期望，因為各自引述不同學科的非均衡體系理論隨著在其本學科的研究成果，致使「非均衡體系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相信藉由資訊科技的協助，發展出實存論的知識論是可能的。然而，在此之前，這些學者必須要發展出容易理解的理論要點及具體的經驗研究，使國際關係學者理解「非均衡體系理論」的知識論效用，而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學界的理解與溝通，確認「非均衡體系理論」是值得發展的國際關係理論。

* * *

(收件：104年12月1日，接受：105年8月18日)

註^⑩ Kai E. Lechmann,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hases of Complexity's Emergence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pp. 408-410; Emilian Kavalski,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pp. 450-451.

註^⑪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a New Paradigm*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Walter C. Clemens J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An Analysis of Systemic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Speculation: The Reflection of Non-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Hsueh-Chen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behavioralism revolu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1950–60s, attempt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y to become scientific began with the theorization of IR through systems theory that engendered the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rough an underdeveloped stage involved with only a few scholars in the 1960s, a contending stage with various approaches proposed in the 1970s, a dominated stage of neorealism in the 1980s, and to an opposite stage of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1990s, IR theory experienced decades of systems theor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R scholars adopted the 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s, structures, and changes. The 2000s–2010s saw the birth of a new 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of “modern system theory” and a non-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of “complexity theory,” both greatly enriched the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ocess by which IR scholars use systems theory to theorize international systems. From 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to non-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continuity, dynamicity, and diversity of IR theory are revealed. This paper (1)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ystem theory introduced by IR scholars to show case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s theory in IR theory, (2) explores the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catalog their differences, (3) present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mergent “modern system theory” and “complexit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ization, (4) explores the epistemological speculation on the equilibrium system theory and non-equilibrium system theory, an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binary opposition about the two theories, and (5) discuss the complexity theory’s impacts on IR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he proces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s Theory, 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Non-Equilibrium Systems Theory, Complexity Theory

參考文獻

- 李君韜譯，社會中的法（臺北：五南，2009年）。
- 胡育祥，「魯曼社會體系理論中的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政治與社會哲學*，第36期（2011年3月），頁87~121。
- 高宣揚，魯曼社會體系理論與現代性（臺北：五南，2002年）。
- 張嘉尹，「國家理論－體系理論的觀點」，*淡江大學法政學報*，第1卷第5期（1996年），頁87~107。
- 張錦惠譯，社會中的藝術（臺北：五南，2014年）。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2002年9月），頁111~148。
- 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爭論：國際關係學科的科學進展反思」，*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3期（2013年9月），頁1~41。
- 郭雪真，「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國際體系理論化觀點之方法論評析」，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13年會暨第6屆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主辦，2013年12月7日）。
- 郭雪真，「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評析」，*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3期（2013年），頁63~96。
- 陳欣之，「國際體系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2期（2007年4-6月），頁23~52。
- 萬毓澤，「讓盧曼的體系理論（重新）成為問題：一個本黑式的視角」，*社會理論學報*，第12卷第1期（2009年），頁147~94。
- 葉啟政，邁向休閒社會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 劉育成，「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體系論觀察」，*政治與社會哲學*，第36期（2011年3月），頁39~86。
- 魯貴顯譯，盧曼社會體系理論導引（臺北：巨流圖書，1998年）。
- Albert, Mathias, "Observing World Politics: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of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8, No. 2 (1999), pp. 239~265.
- Albert, Mathias, "What Systems Theory Can Tell Us About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p. 93~111.
- Albert, Mathias, "On the Modern Systems Theory of Society and IR: Contacts and Disjuncture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izing," in Mathias Albert and Lena Hilkermeier eds.,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3~29.
- Albert, Mathias and Lena Hilkermeier,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Albert, Mathias, “‘Globalization Theory’: Yesterday’s Fad or More Lively than Ev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 No. 2 (2007), pp. 165~182.
- Albert, Mathias and Lars-Erik Cederman, “Introduction: Systems Theorizing in IR,”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3~22.
- Albert, Mathias,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3~68.
- Albert, Mathias and Barry Buzan, “Differenti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2010), pp. 315~337.
- Albert, Mathias and Stephen Stetter, “Embedd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abric Differentiated World Society and a Differentiated System of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1~84.
- Albert, Mathias,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Int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urm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4.
- Axelrod, Robert M.,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arder, Alexander D., “Global Cognitive Justice: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4), pp. 653~665.
- Bousquet, Antoine, “Chaoplectic Warfare or the Future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5 (2008), pp. 915~929.
- Bousquet, Antoine and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43~62.
- Bousquet, Antoine,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War on Terror: Understanding the Self-Organising Dynamics of Leaderless Jih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3 (2012), pp. 345~369.
- Braumoeller, Bear F., “Understanding System Dynamics: Simple Models of Complexit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58~191.
- Bryen, Stephen D., *The Application of Cybernetic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 Politics* (Hague, Netherland: Martinus Nijhoff, 1971).
- Bull, Hedley,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April 1966), pp. 361~377.
- Bull, Hedley, *The Anarchy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uzan, Barry,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pp. 327~352.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uzan, Barry,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uzan, Barry,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New Systems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95~219.
- Cederman, Lars-Erik, "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esurrecting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27~157.
- Checkel, Jeffrey T.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indea, Ion, "Complex Systems-New Conceptual Tool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No. 26 (2006), pp. 46~68.
- Clemens, Walter C. J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3).
-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2 (2010), pp. 399~416.
-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2011).
- Cudworth, Erika and Stephen Hobden, "Of Parts and Who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Human," *Millennium*, Vol. 41, No. 3 (2013), pp. 430~450.
- Diehl, Paul F., "Theorizing at the Highest Level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4), pp. 687~689.
- Dunne, Tim,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 Earnest, David C. and James N. Rosenau, "Signify Nothing? What Complex Systems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Global Politic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3~163.
-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Geller, Armando, "The Use of Complexity-base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echnical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f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63~80.
- Geyer, Robert and Steve Pickering, "Applying the Tools of Complex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From Fitness Landscapes to Complexity Cascad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1), pp. 5~27.
- Glover, Robert W., "Compatibility or Incommensurability?: IR Theory and the Complex Systems Analysi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www.e-ir.info/2012/07/21/compatibility-or-incommensurability-ir-theory-and-complex-systems-analysis/>.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14.
- Gunitsky, Seva,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5, No. 1 (2013), pp. 36~63.
- Harrison, Neil E. and J. David Singer, "Complexity is more than Systems Theory,"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25~41.
- Harrison, Neil E.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a New Paradigm*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 Hobson, John M.,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4, No. 4 (2007), pp. 414~430.
- James, Patric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ames, Patrick, "Systemism, Social Mechanism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4, No. 3 (2004), pp. 352~370.
- Jaeger, Hans-Martin,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a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69~96.
- Jervis, Robert,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ones, Roy,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 Kaplan, Morton A.,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 Kaplan, Morton A.,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1 (October 1966), pp. 1~20.
- Kaplan, Morton A., "System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orton A. Kaplan ed.,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1968), pp. 381~404.
- Kaplan, Morton A., "Systems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ocial Research*, Vol. 35, No. 1 (1968), pp. 20~47.
- Kaplan, Morton A., *Macropolitics: Selected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 Kaplan, Morton A., "Systems Theory and Objectivity," *Theory and Decision*, Vol. 5, No. 4 (1974), pp. 441~446.
- Kaplan, Morton A., "Som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Resear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6), pp. 51~84.
- Kavalski, Emilian, "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p. 435~454.
- Keohane, Robert,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6.
- Keohane, Robert O.,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issane, Dylan, "Mapping International Chaos," *Contemporary Issues*, Vol. 3, No. 1 (2010), pp. 17~27.
- Kissane, Dylan, *Beyond Anarchy: The Complex and Chaotic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ttgart, Germany: Verlag Press, 2014).
- Knorr, Klaus and Sidney Verb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Introduction,"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1961), pp. 1~5.
- Knorr, Klaus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Lampert, Donald E., Lawrence S. Falkowski, and Richard W. Mansbach, "Is Ther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2, No. 1 (1978), pp. 143~166.
- Lechmann, Kai E.,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hases of Complexity's

- Emergence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7, No. 3 (2012), pp. 404~413.
- Little, Richar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arge-Scale Historical Change,” in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London: Pinter, 1994), pp. 9~27.
- Little, Richard, “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1995), pp. 9~34.
- Linklater, Andrew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42.
- Luhmann, Niklas, “The World Society as a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Vol. 8, No. 3 (1982), pp. 131~138.
- Luhmann, Niklas,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uhmann, Niklas, *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 Luhmann, Niklas, *Law as a Social System*, translated by Klaus A. Zieg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uhmann, Niklas,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Cambridge: Polity, 2012).
- Maoz, Zeev,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McClelland, Charles A.,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 McClelland, Charles A., “Applications of General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Thought* 12 (1955), pp. 27~34.
- Navari, Cornelia 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Nexon, Daniel, “Relationalism and New Systems Theory,”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99~126.
- Pepinsky, Thomas B., “From Agents to Outcomes: Sim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3 (2005), pp. 367~394.
- Richards, Diana, “A Chaotic Model of Power 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1993), pp. 55~72.
- Root, Hilton L., *Dynamics among Nations: The Evolution of Legitimacy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Stat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3).
- Rosenau, James N.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p. 412~420.
-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 Saperstein, Alvin M., "Alliance Building versus Independent Action: A Nonlinear Modeling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6, No. 3 (1992), pp. 518~545.
- Snyder, Quddus Z., "Taking the System Seriously: Another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5, No. 4 (2013), pp. 539~561.
- Stetter, Stephan ed., *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World Society: Modern System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Suganami, Hidemi,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sm: An Anatomy of British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5 (1983), pp. 2363~2381.
- Walby, Sylvia,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eory, and Multiple Intersecting Socialinequaliti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7, No. 4 (2007), pp. 449~470.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 Waltz, Kenneth,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p. 21~37.
- Waltz, Kenneth,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5~41.
- Watson, Adam,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Expansion"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32.
- Weltman, John J.,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Polity*, Vol. 4, No. 3 (1972), pp. 301~329.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9~71.
- Wendt, Alexander, "Flatland: Quantum Mi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Hologram,"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279~310.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81~219.